

## 主报告

# 中国改革中期的制度创新与利益调整

## 一、基本思路和分析框架

### 1. 两个转变中的中国

在新的世纪即将来临的时候，中国也处于本世纪以来最深刻的转型时期，这种转型是有两个深刻转变所构成的：一是体制的转轨（Institutional Transition）即从高度集中的计划再分配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二是结构的转型（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即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的传统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社会的转型。这两个转变虽然在中国十几年改革的现实中表现为一个过程，性质却是完全不同的。体制转轨作为一种特定的改革，是在原计划再分配经济体制国家发生的，即便是渐进式改革，也要求

在相对有限的时距中完成制度创新，因为长时期的体制摩擦和规范真空会造成社会的失序。结构转型是世界各国实现现代化必经的过程，它实际上是一个比人们主观期望更为漫长的过程，往往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才有可能真正改变一个国家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位置。这两个转变的同时进行以及中国保持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使中国的发展既有别于体制转轨的前苏联、东欧国家的模式，也有别于东亚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的模式，构成了中国目前社会发展进程的“中国特色”。

## 2. 三种资源配置的力量 市场、国家、单位

对社会发展复杂性认识的日益加深，使社会资源的概念在今天已经有了更加丰富广泛的内涵，它不仅包括土地、资本、劳动力、原材料等物质资源，也包括技术、教育、制度、信息等人力资源，在社会学的分析中，它还包括了权力、地位、声望、人际关系等社会交往系统的象征性资源。对社会资源的配置方式，是决定社会发展进程的决定性因素。对目前处在两个转变中的中国来说，现实中存在着三种资源配置的重要力量。首先是市场，这是人类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有效的资源配置手段，它通过市场化价格调整各种供求关系，并通过有序竞争规范引导人们本能的寻利行为走向社会的福利最大化目标。其次是国家，国家应当是社会公正和公民普遍利益的化身，它要通过再分配、社会核算、立法、制定发展政策和发展战略等手段保证社会的公正和可持续发展，保证市场交易规则

与一般社会交往规则的协调统一。在现实中，经济人和经济组织不可能自发的进行社会核算，他们只能从自身的经济核算出发追求市场效益，尽管这种效益往往是以成本外部化为代价的（如污染环境等），国家则有责任使他们同时遵守社会核算的规则。在避免垄断、克服负面外部效应、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进行长期战略投资、建立社会保障体系、防止特殊资源进入市场（如权力和轴）、保证社会公平和经济社会稳定等“市场失灵”领域，国家要起到资源配置的主导作用。第三种资源配置的力量是单位，在经济生活中主要是指企业，特别是实行着单位制的企业。企业是不同于市场和国家的资源配置力量，在中国目前的转型期，它的作用就更加明显。就国有企业来说，行政放权和承包使企业成为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这样占有和使用企业资源的单位的利益，实际上有别于企业所有者的利益。出于这种单位利益以及企业家自身的利益，企业管理者一方面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另一方面也追求职工和个人收入的最大化。在单位保障的体制下，企业还要在初次分配中完成再分配的社会功能和承担起就业保障的责任。在体制转轨时期，企业单位利益的相对独立性以及其资源配置能力的增强，一方面有利于市场化的过程，另一方面也造成所有者利益的流失。

### 3. 体制转换的新阶段：冲突与创新

改革已经越过了单纯突破旧体制和普遍的双轨制运行阶段，放权让利和通过改革释放原有体制能量的过程也已经基

本结束，改革已到中期，进入了制度创新阶段。体制改革的关注点已经从农村转到作为经济中心的城市，深入到财税、金融、国有企业、社会保障等牵动全局的体制“硬核”越来越触及到利益格局的刚性部分。改革的难度明显地增加了：结构变迁、职业分化、多种产权主体的并存和竞争以及市场驱动机制的形成，使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主体化、独立化趋向日益明显，使所有利益群体普遍受益的改革已经不太可能了，似乎任何新的改革都要触动一些基本社会群体的利益。利益的分化和冲突成为造成新阶段出现的各种新的社会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并使改革进入一个新的公共选择过程。

#### 4. 利益整合和制度化

在目前制度创新的新阶段，长期的现代化过程中的结构性矛盾与体制转轨过程中积淀的问题纠缠在一起，国家在改革中的利益补偿能力尚不足，但又必须在稳定中以果断的改革开辟前进道路，以免使问题积重难返，进一步加重改革和发展的成本。在这种情况下，对社会基本利益主体之间的重大利益关系的分析显得格外重要，因为这不仅涉及如何调整基本利益关系、化解社会的利益摩擦和冲突，更重要的是涉及对改革方案的公共选择和如何在新时期确立社会公正价值观。在现实中，一项改革方案能否顺利实施和取得成效，并不仅仅取决于方案是否完备或是否符合理性设计，而是取决于能否被大多数参与改革者所认同和接受。虽然说被大多数改革参与者所认同和接受的方案并不就是“最佳的”或“最经济”的方

案，但利益上的整合显然是一切改革方案的“可操作性的”基础。在一定的阶段，通过各种行政手段调整利益关系，可能是有效的和快捷的，但从长治久安的要求来看，必须尽快提高利益整合的制度化水平，建立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新秩序。

## 二、1991~1995：新一轮增长周期的完成

经济呈现高峰、滑坡、低谷、复苏的周期性发展这是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社会主义经济也概莫能外。1991~1995年，是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八个五年计划时期，这个时期也恰恰表现为一个完整的小增长周期。这种周期的形成，既是经济发展的自然规律使然，也有重要的政策导向和行政干预因素的影响，伴随着经济的“扩张—收缩”周期的往往是“放—收”的政策周期。

### 1. 1991 经济从低谷中复苏

1979~1984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不仅工业高速增长，农业也因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焕发出新的生机这种发展势头在1984年达到高峰，当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15.3% 工业产值增长14.5%，农业产值也极为罕见地增长了12.9%。但是，随后的1985年，虽然工业仍在高速增长，但农业出现了严峻的局面，当年农业产值仅增长1.8% 到1988年，工业高速增长与农业低速徘徊的结构性

冲突使各种潜在的矛盾更加激化，从而出现了供求总量失衡，部分商品短缺，加之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过快，引发了抢购风和挤兑风。在此情况下，国家从 1988 年的第四季度开始，采取了为时 3 年的“治理整顿”的干预政策，使在高位运行难以着陆的经济很快降温，并进而使供求关系得到基本平衡，经济秩序也明显好转，基础产业薄弱造成的“瓶颈”矛盾也有所缓解。1989 年政治风波之后，治理整顿中的经济又遇到西方一些国家对中国的政治施压和经济制裁，经济在 1989~1990 年跌入低谷，这两年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仅 4% 工业增长年均不到 4%，是改革以来从未出现过的。1991 年，在放松银根的启动下，经济终于从低谷中走出，开始复苏，当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速度恢复到 9.5%，但农业仍未结束低速徘徊的局面，当年农业产值增长 2.4% 而 1989~1991 年 3 年的农民实际收入仅增长 0.7%。<sup>①</sup>

## 2.1992 新一轮增长迅起

围绕着造成经济滑坡的原因，社会上出现种种争论，苏联与东欧巨变的震荡，也使人们对于前进的方向产生了一些困惑，而周边东亚国家的快速发展，又带来巨大的压力。在此关键之际，1991 年春邓小平视察南方，并发表了震动中外的重要谈话，提出抓住机遇，加快改革开放，加快经济发展，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1992 年 10 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改革目标，并建议政府将“八五”计划中原定的国民经

济年均增长 6% 的目标进行调整,提高到年均增长 8%~9%。以邓小平视察南方谈话和中国共产党“十四大”为标志,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改革开放的力度明显加大,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加快,全国掀起了一个新的发展高潮,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出现强劲发展势头。1992 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 14.2%,达到 1984 年以后的最高峰,其中工业产值增长 21.7%,农业产值也增长了 4.7%,服务业产值增长 11.6%。

### 3. 1993:经济发展出现局部过热

1992 年工业的增长速度超过了 1985 年的 18.6% 达到自 1979 年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峰,同时工业与农业增长速度之差达到 17%,也超过了 1985 年工业与农业速度之差 16.8% 的最高点,总量不平衡的老问题又开始出现。然而,从 1993 年 2 月开始,在高位运行的经济仍在升温,至 6 月份工业增长速度达到惊人的 30.2%,虽说下半年中央出台了宏观调控措施,但经济发展局部过热的形势已经形成。1993 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 13.3% 工业增长 20.7% 农业增长 4.7%,工农业增长速度之差为 16%,连续两年工农业增长速度之差如此之大,这是很少有的。1992~1993 年经济的连续高速增长,一方面使经济上了一个大台阶,若以当年价格计算,国民生产总值从 1986 年的 1 万多亿元增加到 1991 年的 2.1 万多亿元,用了 5 年时间,而从 2.1 万亿元增加到 3.4 万多亿元,仅用了 2 年时间;另一方面,经济的局部过热使经济秩序出现

混乱，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猛（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1992 年增长 42.6%，1993 年增长 58.6%），通货膨胀加剧，乱拆借、乱集资、乱摊派、挤占基础建设和农业投资的现象严重，农民负担过重问题极为突出，并出现了全国性的由投机资本推动的“房地产热”、“开发区热”和“股票热”。1993 年全国各地在“圈地热”中纷纷上马的各级开发区达到 8700 多个，规划占地达 1.5 万平方公里，农业用地出现大范围的抛荒撂荒，而全国注册的房地产公司猛增至 3 万余家。

#### 4. 1994: 高通货膨胀达到历史高峰

从 1993 年下半年开始，经济能否软着陆的问题又一次被提出来。1994 年，经济虽然仍在高位上运行，但经济局部过热和经济秩序混乱造成的一系列后果愈发明显地暴露出来，最突出的问题就是高通货膨胀。1994 年全国商品零售价格比上年上涨 21.7%，超过了 1988 年的 18.5% 和 1989 年的 17.8% 的警戒线，同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上涨 24.1%，农副产品收购价格上涨 39.9%，食品价格的上涨尤为突出，平均上涨 31.8%，其中粮食价格上涨 50.7%，油料价格上涨 61.3%，肉禽及其制品价格上涨 41.6%，蔬菜类价格上涨 33.3%。农业形势愈发严峻，1994 年粮食减产近 1000 万吨，城乡和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进一步拉大，一部分居民生活实际水平下降。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国家统计局 1994 年 10 月对全国城乡 2 万居民的问卷调查，控制物价上涨成为当年民众最关注的焦点问题。

### 5.1995 首次基本实现软着陆

面对经济局部过热和经济秩序混乱带来的问题，国家从 1993 年下半年开始采取了新的宏观调控政策，但这次宏观调控方式与以往有所不同：一是在调控手段上强调以经济、法律手段为主，辅之以必要的行政干预，特别注意了以整顿金融为突破口；二是既没有因遏止经济“过热”的要求而采取急刹车的办法，也没有因国有企业资金紧张对信贷的倒逼压力而放松宏观调控的力度；三是把制度创新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内容，于 1994 年对财税体制、金融体制和外汇外贸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1995 年“适度从紧”的宏观调控措施和各项重大改革收到积极的效果，经济增长速度平稳回落，国民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 10.2%，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得到有效控制，物价涨幅回落到 15% 以下，实现了预定的调控目标，金融、外汇、财政、物资四大平衡也有了明显好转，并且避免了经济的大起大落，这是自改革以来经济的首次成功实现“软着陆”。但是，经济回落时期的各种伴随问题再次出现：企业资金紧张加剧，经济效益普遍下滑，企业相互拖欠债务严重，停产半停产企业增多，实际失业率上升。因失业、职工下岗和企业发不出工资而造成的城镇贫困人口的大量增多，成为一个十分严重且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

### 三、新阶段的经济社会发展

#### 1. 经济增长 提前 5 年翻两番

世界经济的发展重心正在从大西洋地区向太平洋和东亚地区转移，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起飞为这一地区注入了新的活力。1985~1994年，东亚和太平洋地区 GNP 年均增长 6.9% 南亚地区年均增长 2.7%，远高于其他地区 and 全世界 0.9% 的年均增长率。<sup>②</sup>发达国家、新兴工业国和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为中国大量的劳动—资本密集型经济提供了更多的发展空间和市场，中国良好的发展前景和越来越由潜在变为现实的庞大市场，吸引了外国资本和技术的进入，加之中国的高储蓄、高投入和低劳动成本，中国进入了经济的快速积累阶段。

1979~1995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9.8%。1991~1995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12.0% 是建国以来增长速度最快的 5 年。1995 年，国民生产总值达到 5.73 万亿元。1980~1988 年，国民生产总值第一个翻番用了 8 年的时间 在此基础上，1988~1995 年的第二个翻番用了 7 年的时间，比原订规划提前 5 年达到 GNP 翻两番的目标。从 1980 年到 1995 年，中国在 15 年的时间里完成了一些国家过去用几十年甚至上百年走完的路程。<sup>③</sup>

## 2. 结构转变:1 亿多农村劳动力“农转非农”

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和城乡结构的转变是结构转型的核心内容，而产业结构的转变是结构转型的第一步。1991～1995 年，第一产业年均增长 4.2%，第二产业年均增长 17.0%，第三产业年均增长 9.9%。从三次产业增长速度的比较来看，农业增长较慢，工业超高速发展，农业与工业增长速度的比例远远超过 1:2 的经验适度比例，说明农业仍然十分薄弱，第三产业也未达到应超过第二产业增长速度的预定目标。尽管如此，产业结构仍朝着现代化迈进了一大步。1990～1995 年，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第一产业所占的比重从 27.1% 下降到 20.6%，第二产业所占的比重从 41.6% 上升到 48.4%，第三产业所占的比重从 31.3% 微降到 31.1%。农业和非农产业产值的比例已基本上是 20:80，超越了世界低收入国家农业产值比重平均 28% (1994 年) 的水平，但第三产业的比重尚未达到低收入国家 36% (1994 年) 的平均水平，后者可能有计算口径的问题<sup>④</sup>，但即便如此，中国的第三产业比重仍然偏低，这与城市化水平偏低有重要关系。

就业结构转变较之产业结构的转变更加困难，但也取得了重要的突破。1990～1995 年，在全国从业人员中，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所占的比重从 60.0% 下降到 52.9%，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所占的比重从 21.4% 提高到 23.0%，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所占的比重从 18.6% 提高到 24.1%。第一产业从业人员的比重从 1978 年的 70.5% 下降到 1990 年的 60.0%，下降 10

个百分点用了 12 年时间,1990~1995 年下降 7 个百分点只用了 5 年时间,就业结构的转变加速了。改革开放以来,已经约有 1.8 亿多农村劳动力转入非农产业,其中约有 50%是 1991~1995 年转移的。然而,目前 52.9%的农业从业人员只创造了 20.6%的国内生产总值,产出效益仍然很低,可供分配的剩余有限,提高农民收入的关键仍然是加速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

### 3. 人民生活:出现新的消费热点

随着经济的增长,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生活质量也有所改善。1991~1995 年,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农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年均增长 4.5%;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实际年均增长 7.7%;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年均增长 10.6%;同期农村贫困人口由 8000 多万减少到 6500 万左右。

1990~1995 年,职工年平均工资从 2140 元增加到 5500 元;全国居民平均消费水平从 803 元增加到 2311 元,城乡居民人均储蓄存款余额从 615 元增加到 2249 元,农村人均住房面积从 17.8 平方米提高到 21.0 平方米,城市人均居住面积从 6.7 平方米提高到 8.1 平方米,城镇电视普及率从 59.0% 提高到 89.8%,农村电视普及率从 44.4% 提高到 80.7%;电话普及率从 1.0% 提高到 4.6%;城市自来水普及率从 89.2% 提高到 93.0%,城市煤气液化气普及率从 42.2% 提高到 70.0%,城市每万人拥有绿地从 32.2 公顷提高到 36.7 公顷。城市家庭耐用消费品消费热点已从 80 年代末的电视机、

电冰箱、洗衣机转向目前的电话、空调和住房，房地产业很有可能成为今后一个时期带动整体经济的支柱产业。中国的减贫事业可能将成为中国 20 世纪下半叶最伟大的工程，中国的贫困人口已经从 1978 年的 2.5 亿人、1985 年的 1.25 亿人、1992 年的 8000 万人持续下降到 1996 年的 6000 万人。

但是，由于近几年来物价、特别是食品价格增长较快，居民的消费结构在总体上变化不明显。1990~1995 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生活消费的恩格尔系数（食品支出占生活消费支出的比重）基本没有变化，一直在 58.6%~58.9%；城镇居民家庭人均生活消费的恩格尔系数从 54.2% 下降到 50.0%，但同时房租水电煤气支出所占的比重从 2.5% 上升到 7.1%。尽管从国际比较看，中国城镇居民消费恩格尔系数偏高很大程度上受福利政策下住房支出比重偏低的影响，但从中国自身的纵向比较看，近些年在住房支出明显增加的同时，生活消费结构的改善却并不明显。部分城市居民生活水平下降，城市贫困成为新的社会问题，根据国家统计局 1995 年对全国 35520 户城市家庭的抽样调查，1995 年全国有 10% 的城市家庭最低收入户人均月生活费收入仅 160 元，按家庭人口系数和全国城市人口推算，这样的低收入家庭涉及到 3400 多万城市人口，而且其中有一半的困难户人均月生活费收入不到 145 元。

#### 4. 城市化 流动民工的冲击

城市化水平是一个国家的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之

一。但是，在较长一段时间里，由于二元结构造成的城乡分割，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一直滞后于工业化的发展，目前也仅仅相当于世界低收入国家城市化的平均水平。不过，近几年来，中国的城市化速度在加快，而且出现了一些新的可喜变化。1991~1995年，中国市镇总人口增加了 4631 万人，乡村总人口只增加了 667 万人。

1990 年以前，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主要方式是通过乡镇企业，其主要特点是“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这曾被誉为中国式的独特的城市化道路。1984~1988 年，乡镇企业每年吸纳的农村劳动力 1084 万人，而同期从农村迁出的劳动力总共只有 300 万人左右。90 年代的情况就大不一样了，由于乡镇企业的资本增密和技术增密，乡镇企业的就业吸纳能力开始下降，1989~1995 年，乡镇企业平均每年仅新吸纳农村劳动力 593 万人。与此同时，随着城市建筑业和服务业的大发展，外出打工的流动民工人数迅速地增加。根据各种大规模抽样调查的推算，农村外出的流动民工总量，1993 年为 5100 万人，1994 年增加到 7100 万人，1995 年达到 8000 万人左右。<sup>⑤</sup>这些如潮水般外出的民工，80% 以上进入了城市，尽管带来或者加剧了一些城市问题，如交通拥挤、治安恶化、卫生下降，但毕竟大大加快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城市化的速度。1991~1995 年，中国统计上的城市化水平（市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 26.4% 上升到 29.0%，但如果把约 6500 万进城民工计算在内，城市化水平则达到约 34%。

1990~1995 年，中国的城市从 461 个增加到 640 个，其

中 200 万人口以上的城市 10 个,100 万人~200 万人口的城市 22 个,50 万人~100 万人口的城市 43 个,20 万人~50 万人口的城市 192 个,20 万人口以下的城市 373 个。对城市化推动最大的依然是乡村中的镇,1991~1995 年全国的镇从 11882 个发展到 17282 个,平均每年新增 1350 个。

### 5. 人口增长 低增长率、高增长量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第一大国,在任何情况下人口都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变量,控制人口增长,已成为中国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1991~1995 年,中国的总人口由 11.58 亿人增加到 12.11 亿人,人口出生率从 19.68‰ 下降到 17.12‰,人口死亡率从 6.70‰ 下降到 6.57‰,人口自然增长率从 12.98‰ 下降到 10.55‰。在有效的行政干预下,中国的人口发展阶段超越了经济发展阶段,已开始进入人口“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阶段,目前中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不仅低于低收入国家的 18‰ 的平均水平,也低于中等收入国家 15‰ 的平均水平。<sup>⑥</sup>全国的妇女总合生育率保持在 2‰ 左右,已略低于人口替代水平。国民素质有了显著提高,婴儿死亡率接近高收入国家水平,人均预期寿命达到 70 岁左右。

然而,由于人口基数庞大,1991~1995 年仍年均净增人口 1324.5 万人,平均每年抵消掉约 7% 的新增国民生产总值。而且,在低收入发展阶段的中国,人口老龄化却过早到来,根据 1995 年全国 1% 人口抽样调查,65 岁以上的老年人占总人口的比重已达到 6.7%,其中上海已达到

11.5%；全国劳动人口的总负担系数已达 50.22，其中负担少儿系数 40.16，负担老年系数 10.06。另外，根据 1994 年 10 月全国人口变动情况调查 0.63% 二次抽样数据，15 岁及以上年龄人口未工作的占全国该年龄段人口的 23.2%，约 2.78 亿人，其中丧失劳动能力的 4253 万人，离退休退职的 3828 万人，料理家务的 1.24 亿人，企业停产休业的 295 万人，正在寻找工作的 1393 万人，在校学生 4771 万人，其他未工作者 894 万人。

## 四、中国进入改革中期的制度创新阶段

### 1. 原有体制能量释放的过程基本结束

中国在改革初期迅速获得的成就，主要得益于两个因素：一是通过体制改革把生产者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二是通过体制改革把原有体制中受到压抑的物质能量释放出来。

改革以前，中国实行的是高积累、高投入、低工资、低消费的发展战略，这种战略在通常的情况下被概括为“先生产、后生活”。1958~1978 年的 21 年间，农民人均纯收入仅增长 61 元，平均每年仅增长 2.9%；同期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平均每年仅增长 1.4%；职工平均工资则增长的更慢，1953~1978 年的 26 年间平均每年仅增长 0.5%。而与此同时，1953~1978 年仅国家的基本建设投资就从 90.4 亿元增加到 501 亿元，增长了 4.6 倍，在此期间，国家基本建设投资的积累率

(基本建设投资 / 国民收入总额) 通常都在 15% 左右。这种在高积累、高投入、低工资、低消费政策下储存起来的生长能量, 在体制改革以后得到逐步的释放。但是, 这个体制能量释放的过程目前已经基本上结束。

原有体制能量释放过程基本结束的标志之一, 是农业基本建设投入比重的下降。中国农业历来对灌溉系统的依赖度很强, 农田整治、灌溉系统和精耕细作是农业稳产增产的重要因素。但是, 改革以后, 由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人们的注意力仍然集中在生产关系的变动所带来的变化, 忽略了农田分割耕作以后在集体的公共灌溉系统的建设方面所可能产生的问题。特别是 1985 年以后, 随着工农业比较收益差距的拉大, 农业投入的比重减少, 不仅很多大型水利建设处于年久失修的状态, 而且很多原有的灌溉网络也因农田分割、工业开发等原因而遭到破坏。在国家基本建设投资中农业(农、林、牧、副、渔、水利业)投资所占的比重: “一五”时期(1953~1957年)为 7.1%, “二五”时期(1958~1962年)为 11.3%, 1963~1965 年为 17.6%; “三五”时期(1966~1970年)为 10.7%, “四五”时期(1971~1975年)为 9.8%; “五五”时期(1976~1980年)为 10.5%; “六五”时期(1981~1985年)下降到 5.0%; “七五”时期(1986~1990年)进而下降到 3.3%, 1993 年下降到 2.8%。1994 年起国家统计局改变了农业的投资分类方法, 剔除了副业, 并将水利业并入地质勘察业。按此口径计算, 农业(农、林、牧、渔)投入占基本建设投入的比重, 1985 年为 1.6%, 1990 年为 1.5%。而